

女囚

季音題



季音 纪白薇 王于畊

福建教育出版社

女 囚

季 音 纪白薇 王于畊 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3 年

(闽)新登字 02 号

女 囚

季音 纪白薇 王子畊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梦山巷 27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地质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塔头街 19 号 邮编:350011)

850×1168 32 开 9.125 印张 220 千字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4-1478-0/G·1120 定价:7.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调换

前 言

这是一本用血和泪写成的回忆录。

这是一本在黑暗的旧中国，一群追求革命理想的女青年悲惨遭遇的真实报告。

这是中国妇女革命斗争史上，熠熠发光的一页。

事情发生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初：1941年1月，正是抗日战争的第五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已经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中华儿女正在与外敌进行浴血苦斗。可是，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竟然不顾民族大义，秘密调动大军，在长江南岸的安徽泾县，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突然袭击在抗日战争中战功卓著的新四军，使这支英雄军队蒙受了重大伤亡。大批爱国将士战死在内战战场；一批新四军男女干部，不幸成为阶下囚，被押解到国民党第三战区首脑机关所在地江西上饶，关进了新设立的上饶集中营。

在“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内的反共顽固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新的反共高潮。第三战区的特务机关，在尚未沦陷的闽、浙、赣地区，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一批批青年男女，被投入了上饶集中营。

本世纪四十年代，国民党反动当局效法德国法西斯，在各地遍设集中营，囚禁爱国者。上饶集中营是规模最大的一个。被囚禁的就是上述两部分革命人士。

被囚禁在这个法西斯魔窟里的“爱国囚徒”中，有四十余名年轻妇女，她们多数是在皖南事变中被俘的，其余则是从各地先后被捕的女青年。姑娘们来自天南海北，年龄大多在二十岁上下。日寇入侵，国家面临沦亡的危急关头，她们毅然离开温馨的家庭，告别父母，告别学校，走进了抗日革命行列，她们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女儿。万万没有料到，历史竟然出现了这样的倒行逆施，这群纯洁、热情、充满朝气的女青年，被无理剥夺了抗日救国的权利，竟锒铛入狱，成了集中营的女囚。上饶集中营建立初期，她们被分别囚禁在两个队。后来，集中营特务为了便于控制，就把她们全部集中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单独的女囚队。

在旧中国的监狱史上，集中了这么多“红色女囚”的特殊牢狱，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集中营是折磨、凌辱、以至屠杀人的地狱。但对革命者来说，它又是一个战场。在这个女囚队里，共产党员们成立了秘密党支部，团结和带领姐妹们，与国民党特务分子进行了英勇无畏而又机智的战斗，她们维护了真理，维护了正义，维护了妇女的尊严，伸张了人间的正气。当然，她们也为此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九个姐妹，惨死在敌人屠刀之下；八人被枪杀，一人遭活埋。

《女囚》这本书，就是这幕历史悲壮剧的真实纪录。

本书作者绝大多数都是当年上饶集中营的幸存者，她们所写的，都是本人亲身经历的真人真事，文字朴素，感情真挚，没有一点虚夸与渲染，书中介绍的施奇、七姐妹等烈士殉难的经历，事迹感人肺腑，读了使人泪下。这些文章，既是珍贵的历史纪录，又是教育后代人的有益教材。

在上饶集中营殉难的七姐妹中，二十六岁的杨瑞年是个杰出的代表。为纪念这位伟大而平凡的女战士，本书收进了王于畊同

志撰字的“长江的女儿”一文。这篇回忆录以清新的文字与深刻的剖析，把壮烈就义的杨瑞年烈士，活生生地再现在读者面前。作者不是像许多回忆录那样，着力于叙述事件的经过，而是着力于写人，写杨瑞年在人生道路上经受过的委屈与不平，写她的坚韧、豁达与乐观的鲜明个性。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不屈的年轻女共产党人的形象。1992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文艺评论，曾对“长江的女儿”作出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是革命回忆录写作的一个新突破，新收获。

历史走着曲折的路。这群在法西斯集中营里受尽折磨，送走了几个青春年华的姑娘们，她们在回到革命队伍之后，有相当一部分人，却受到了不应有的歧视，境遇相当坎坷。特别是在十年动乱中，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在骇人的罪名下，横遭残酷批斗，有的竟不幸抱憾离世。收在本书中的“她们没有眼泪”、“人生多坎坷”等文章中，都部分地记述了这方面的一些情况。

红色女囚们经历过的那个时代，如今已经永远过去了。自然，历史不能忘记，也不应当忘记。何况，法西斯幽灵今日又死灰复燃，正在西方国家的某些阴暗角落里蠢蠢而动，妄图东山再起。一切善良的人们，对此务必保持高度的警觉。

让我们重温半个世纪前著名反法西斯英雄伏契克，在临刑前发出的呼吁：

“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啊！”

季 音

1993年2月于北京

目 录

长江的女儿

——忆杨瑞年同志..... 王于畊 (1)

七姐妹殉难记..... 季 音 (23)

一座“活”的雕像

——记施奇..... 何 卓 (34)

好大姐戴庆哲..... 刘希孟 李锦 许平凡 郭立言 (44)

怀念瞿淑和薛克白夫妇..... 李 纪 (51)

徐韧、任光夫妇之死..... 谷斯钦 (60)

红色女囚的抗争

——记上饶集中营女囚队的斗争

..... 部分“女囚队”老同志 (80)

我们四个女机要员..... 毛维青 (102)

女囚生活五年

——一个泰国华侨女青年的经历..... 钟 时 (119)

冲出黑牢

——一个纺织女工的回忆..... 顾莲英 (152)

云岭·周田·老鼠排..... 冯 云 (160)

被捕前后

——一个女新闻工作者的遭遇 林 琼 (170)

炼狱苦斗 林 莺 (186)

她们没有眼泪

——记九个姐妹的苦难历程 李 艺 (200)

人生多坎坷

——记沈锐 肖 谷 (259)

附录三件

国民政府内政部关于东南分团处决学员情况的呈文 (277)

战区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文件《奸伪分子赤石暴动实录》
..... (278)

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公函 (280)

后记 (282)

长江的女儿

——忆杨瑞年同志

王子明

杨瑞年同志壮烈牺牲，至今已半个世纪了。她牺牲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死在国民党反动派因日寇进攻浙赣线，集中营移往福建的路上。1942年6月19日，在武夷山脚下的荒废茶园里，国民党特务和宪兵预先布置了一个屠场，四周架好了枪支，然后把杨瑞年等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干部和一部分浙赣地区的共产党员、进步青年共75人（这是国民党档案中的数字，我们有同志统计为141人）押来，于是废茶园里口号声、国际歌声和密集的枪声骤起，烈士们当即分批被杀身亡。

在这场屠杀的整个过程中，杨瑞年同志始终没有低下她骄傲的头，她血流满面领唱《国际歌》，身中三弹仍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直置身中七枪，连头颅都打碎了，才倒在血泊中，她刚烈而威严的死撼天动地，使刽子手们、国民党的特务、宪兵都感到震惊和惶恐，有的宪兵因此逃跑，从而泄露了这次血腥屠杀的全部真相。

战争时期音讯阻隔，消息传来，先是只听说集中营的同志暴动，后来听到杨瑞年等同志的慷慨赴死。我和这批烈士中的一部分同志在皖南就认识，但最熟悉的是杨瑞年。她和我同于一九三七年冬参加驻军在山西临汾的八路军学兵队，学习结业后又一起分配到新四军，从临汾到新四军的一路上，她都是我的班长，又

一同分配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在团里她也当过女同志的队长，又是观众热爱的优秀演员。1938年秋，她调到军教导大队当文化教员，我们也还时常见面；1940年4月我随团离开皖南，这才分了手。杨瑞年是那种一次见面就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何况我们亲密相处了这么长时间呢。她的热情，包括她某些时候的任性，她的率真正直，乃至她有时候的锋芒毕露，她的那些往往被“缺点”掩盖着的优点，在她牺牲之后，更加引起我的思索和怀念，而她在种种委曲中始终不渝的对党的一往深情，她备受磨难而弥坚的对共产主义的不变信仰，则更加引起我深深的感佩。

杨瑞年出生在长江之滨的名城镇江，长江是她的“母亲河”，她的一生像长江一样汹涌澎湃，她的性格又像长江一样奔放无羁，她要求自己进步的心也像长江一样流向前方从不止息。瑞年，你就是长江的女儿，多年来我思念你，向人们谈你，我都说你是长江的女儿，你会同意的，老同志们也会赞许我对你的尊崇的。

—

瑞年年龄长我五岁，参加八路军大约也略早于我。在我的记忆中，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已经是一派老兵和大姐姐的模样了。

那是1937年的严冬，在山西临汾县的刘村，我刚刚入伍到八路军学兵队，第一次参加出早操，天不亮就跑步，直跑到全身发热，背上流出汗来朝阳才从东方的疏林中升起，地面虽有薄雾，天空却是霞光灿烂。朝光中我忽然发现列队里一个女兵有点与众不同，一身阴丹士林布的自制军棉衣，一色鲜蓝，裁制合体，一条马裤尤其威风，头上戴的是一顶赭色的皮质航空帽，在这一群穿着灰棉军服的同学中，显得很突出。收操了，我好奇的向她走去，巧的是她也向我走来。看清楚了，她很漂亮，不但身材好，脸色

也是那种娇艳的桃红，我猜她是南方人。她把那顶小航空帽一把摘下，黑发上立时冒出白气，又伸出手来抓住我的手，笑呵呵地问我：“刚来吗？”从那里来的呀？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她说话很快，没一点生分，就像姐姐对妹妹那样亲热。我还没有来得及一一作答，她就搂着我的肩膀，一同走回村里。这里是离黄河不远的汾河畔，一片平川，村子也大，我们各个学员班就分住在村上的各户农民家里。我先到了，她同我握握手，然后向她自己的住处快步走去。我站在门口目送她的背影，望着她这一身大概为从军而自己置备的服装，一下联想到我们抗战前后常读常唱的《木兰诗》：“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鞵，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然后是“朝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我想杨瑞年这一身戎装，一身英气，也真有点像花木兰。我们现在倒是“暮宿汾河边”了，我但愿以后也能同她在一起，并肩上前线！

自从那天早操后我们互相认识了，她一见我就叫“小王”，把我拉到他身边去。由于她亲切热情，落落大方，见多识广，毫不腼腆，毫不扭扭捏捏，我也乐意接近她，没有几天，彼此就很了解了。我知道她家乡镇江，古称京口，处在长江和古运河的交汇点上，是个山水苍茫，阅尽兴亡的地方。她说她从小就经常独自穿梭往返于大江南北，上中学在扬州，上女子师范在苏州。以后教书、做救亡工作又回到镇江。一舟横渡，“唯见长江天际流”是常事。我问她：你一个女孩，就那么天不怕地不怕吗？她说她不怕天不怕地，一切帝国主义、顽固分子、反动分子都不怕。上高小时她就敢上台发表演讲，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屠杀我同胞的罪行。以后在苏州女师读书，学校当局无理解聘孙起孟先生等一批进步教师（现在知道，孙先生即本届人大常委会的孙起孟副委员长），这件事激起了全校师生的义愤，她被选为学生代表，站在请愿队伍的最前列，冲进江苏省教育厅，当面质问厅长周佛海，

以后她又参加救亡活动，组织读书会，还因此被捕过。我听她谈这一切的时候，从心里很钦佩。我想，作为一个女革命战士，其实她是早在做准备了；她来参加八路军，是有相当的自觉，充分的准备的。

学兵队的训练时间不长，三个月就要结业了。短期的学习，使我们都觉得收获巨大，大家都跃跃欲试，准备一声令下就奔赴战场。就在这时候，八路军总部有个令大家惊喜若狂的安排，让我们学兵队全体同志行军60里到洪洞县的白石村去，同八路军随营学校联欢，并接受朱总司令的检阅。接着是我们今生的第一次长途行军，这使我感到新鲜和振奋，将要见到朱总司令更使我神往，背着背包走这60里全不觉疲累，我们大家都顺顺当当地到了目的地。

当我们列队站在总司令面前时，见到的是一个穿着同我们一样灰棉布军衣，慈爱安详，普普通通的老军人。他向我们讲的是最严肃的关于国家存亡的大事，用的却是最平常最通俗的语言。伟大和平凡竟如此相通！我们早已听过朱总司令的故事，现在站在他面前，听他像谈天一般地讲话，从心里感到暖热和亮堂。他鼓励我们到敌后去打游击，他说他就是我们的游击总司令。我鼓掌把手都拍痛了。他的话语给了我们一种恨不能立即进军敌后，去为水深火热中的中国老百姓做点什么的巨大力量。这的确是一次毕生难忘的会见。解放后我有机会陪同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大姐乘船游闽江和马尾，在闲谈中我提到第一次在山西洪洞见到总司令的事，总司令笑了，他说他记得那次会见，记得那五六百名学生兵，他说：“那是多么好的一群青年人啊！”我高兴极了，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呀！

接着就是同八路军随营学校的联欢晚会。杨瑞年同志有节目：跳舞。在亮得刺眼的汽油灯下，她穿着黑色的紧身服装，上面大

概缀了许多亮片，在汽油灯下神奇地飘闪着点点银光。她跳的是卡尔斯登舞，跳得神采飞扬，激越酣畅，皮鞋急骤地敲击着台板，踢踢踏踏，踢踢踏踏，强烈的节奏里充满活力，迅疾的舞步里透着潇洒，她双眼流盼，笑容满面，用眼下流行的话来说，台下的一千多人是一齐被“镇”住了，激发了一阵阵的掌声。在这吕梁山麓的村子里，在这一千多个穿着灰布军服的人们面前，忽然出现了这样一个叫人眼花缭乱的洋舞蹈，不能不令人感到意外和欢乐！幕落下后人们还在不停地鼓掌，齐声喊着“再来一个”！终于大幕再次拉开，杨瑞年又重复跳了一遍，她这个节目才算结束。

晚会后我问瑞年：“你参军前当过舞蹈演员呀！”她笑了，爽快地回答了我：“做救亡工作什么都要会一点。我们有个化装宣传队，队员要会唱、会跳、会演，我就在那时候学会了这个舞。”并说：“你喜欢么？我教给你。”我连连摇手。我的好朋友纪白薇却有兴趣，真的向她学了一手。

现在想来，这件小事倒也显示了她的性格。一起学习三个月，谁知道她有这个本领？60里行军路上，谁见她背了跳舞用的皮鞋和紧身服？忽然像变戏法一样，一下都变了出来，整个儿来了一个“一鸣惊人”！那个年代的语言里还没有那么多的“主义”，否则“风头主义”一类的帽子，少不得会飞一顶到她的头上。但是我知道，即使有那些帽子在她面前晃悠，她多半也不会在乎的。她就是喜欢我行我素，喜欢各样事情都拔一点尖，喜欢给人一点意外的惊喜，她从来不深沉，可也从来不平庸，不世故，她就是她，不同凡响的杨瑞年。

从洪洞回来不久，学兵队就正式结业了。杨瑞年、纪白薇和我都被分配到新四军。我们是最先离开临汾的第一批人，受到许多同学的热烈欢送，我们这一批大约有七八十人，其中有十来个女同志，班长就是杨瑞年。途中事务纷繁，她以她的模范行动和

有条不紊的管理，证明她是个胜任的班长。再度使我惊喜的是，她居然还会喊操，口令清晰、准确、干脆、响亮，还有几分威严。在临汾到南昌的这半个多月的旅途中，我们十来个女同学在她的率领下，颇像一个训练有素的八路军女兵班，一路上很受人们的称赞。我们也由此增加了做一个女战士的自信。

二

但是，就在这段行程即将终结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事情。

我们从汉口登上轮船，准备船到九江之后再换乘火车到南昌，向刚刚成立的新四军军部报到。上船以后，我们这群穿八路军军装的学兵队同学，加上在武汉加入的几位新老同志，都集中在船上的“大菜间”里。大菜间里的桌椅已经搬走，我们是席地而坐。船启航了，大家都欢欢喜喜在谈笑、唱歌。明月从江中升起，江面上一片清辉，浩荡长江在静静东流。我站在船窗前，看着江上夜景，也回忆着不久前渡过的咆哮黄河，想到黄河的威猛，想到长江的宽厚，想到黄河、长江所哺育的中华民族的命运，想到我们即将投入的保卫黄河、保卫长江的伟大战争，心中涌出无穷的遐思，可是有人在喊“小王”了，我听出是班长杨瑞年，便赶紧向她走去。

杨瑞年搀扶着一位我不认识的男同志，刚在舱房的一角找到一个地方坐下，她对我说，这是一位老红军同志，是延安派到新四军去的。此刻正在发高烧，似乎还晕船，要呕吐，她要我帮她弄些冷水来。我找遍全船，才找到一个小吊桶，又试着从船舷放下小桶去吊水，可是不行，我拉不上来，幸好有个男同志跑来，才帮我从江中提上了这一小桶水。我连忙提着水桶送到杨瑞年那里。只见她正用毛巾在为这位病人擦脸，见我提来了水，就在桶里涮

了涮毛巾，绞得半干，拆叠成宽宽的一条敷在病人的额头上，接着又用这桶水为他洗手洗腕。转过身来，又从自己皮腰带上取下她的水杯，叫我去灌一杯开水。我捧着水杯交到她手中，她又向我要了一把小匙，像喂小孩那样，一匙一匙把水送到病人唇边。舱房这个角落虽然灯光暗淡，却还能见得到人，也听得见吞咽的声音。杨瑞年坐在病人身边，招呼我坐在她身后，轻声对我说：这位老红军参加过长征，又多次负伤，我们要帮助他。正说着，老红军忍不住要呕吐了。我连忙送上我的水杯给杨瑞年，她一只手扶起这位老红军的头，让他吐在水杯里，另一只手拍打着他的背。待吐过了，又让他漱口，再喝点开水，然后轻轻放下他的头，让他躺好，待到同我一起把溅到舱板上的呕吐物擦拭干净后，她要我去睡一会。我问：“你呢？”

“我陪他，等他退烧再睡。”

我找到我的好朋友小纪，在她身边躺了下去，但是没有一点睡意。刚刚看到的一切使我感到意外，想不到一向风风火火的杨瑞年，在服侍病人的时候竟温柔体贴得像一个最好的女护士。

次晨，那位老红军的烧退了，和我们一起下船。下船前，他忽然走到我面前，举手敬礼，用四川话说：“谢谢！昨晚辛苦了你们！”我在他身边看到了杨瑞年，她微笑着，还带着几分得意。

到南昌后，安排我们就住在离军部不远的一所中学里，一间略大的教室，男同志住一半，女同志住一半，中间堆放着暂时不用的行李杂物。那位在船上发烧的老红军，也住在男同志那边的大统铺上。中学的操场，正好供我们操练。操场边上已经挖了一个大防空洞。南昌这个省城，既出现了战时的繁荣，又常遇空袭。司令部派人来反复交代纪律，如不准远出等等，但上街走走还是可以的。我和小纪上过街，也随人到过百花洲。听说十年内战中，国民党的剿共总司令部，也有人说是蒋介石的行营，就设在百花

洲。那是个颇不错的园子，当时正桃红柳绿，还是很吸引人的。天已热起来了，我们发了单军衣。

谁想得到呢，杨瑞年竟同那位老红军一起上街了，还有人说吃小馆去了。人们悄悄说着。我想这大概是老红军对杨瑞年的热心帮助的酬谢吧。似乎并没有什么可非议的。

那晚吹了熄灯号之后，我已朦胧入梦，忽然被几声大嗓门的斥骂惊醒，听到的是：“……为什么盯我们的梢？我犯了那条军法？你们说！谁有种谁站出来！谁有理谁去报告项副军长！我不怕！……”原来是那位老红军在大发雷霆。我被吓得推醒了身侧的小纪，睡在我另一侧的杨瑞年也挤过来了，靠在我身上簌簌发抖。她轻声对我说：“他嚷嚷什么？我的手都被他气冰凉了！”我握住她的手，手真凉，还在颤抖。我拉她过来紧贴住我，小声说：“我们不听这个，我们睡觉。”我用被子把我们两人的头都蒙了起来，心里却直嘀咕：这算个什么事呢！

大教室内很快安静下来。老红军发脾气，没人敢搭腔，他想吵架没有对象，事情就罢了。可是在我身边睡着的杨瑞年却翻腾了一夜。第二天早饭后，我和小纪拉着杨瑞年去百花洲玩，遇见学兵队同学刘大伟，给我们三人照了那张拍于1938年3月的照片，它留下了三张欢笑的脸，我们都穿着新的新四军军服，却摘下了军帽，三个女孩样的兵站在一个空着的大缸里，这张照片多少年我一直保存着，偶然取出来看看，自己都觉得三个青春年少的女战士多么可爱。皖南事变后，瑞年和小纪都被囚在上饶集中营受苦受难，我还常常背着人取出照片，望着她们悄悄抹泪。

那天，我们三个人坐在树荫下谈天，平时能言善辩的瑞年却很少说什么。我和小纪见她眼睛虽然还有点红肿，但心情已趋平静，就问她：“真有盯梢的吗？”她点点头。我们又问：“那位老红军对你有什么表示吗？”她摇摇头。小纪很气愤，顺口说了句东北

话“盯梢，哪个坏小子干这种缺德事！”瑞年低着头在思索什么，过了片刻才抬起头来说：“小王、小纪，你们知道女权、妇女解放这些问题吗？”我的确不懂“女权”是什么含意，摇了摇头。她说：“但愿你们永远别长大，就不会碰到这类问题了。”我听她这么一说就笑了：“你呀！长大了，女大当嫁了，就要争女权了，是吗？”我说完就脱身跑开，哈哈地笑着。小纪也跟着我开她的玩笑。可是转眼一瞧，杨瑞年并没有追赶我们，只有一脸的严肃。我们便不再说话，乖乖地随她回到了驻地。

又一个第二天早晨，我们刚要出去早操，我和小纪却被人唤住了，原来是他，那位老红军。他粗壮的身躯挡在我们面前，说：“我叫吴焜，刚从延安调来新四军。小同志，我马上就要出发到部队去了，有点事托你们。”我听着并端详着他，觉出他是认真和诚恳的。他取出一封信，信封下面还别着五元钱。他说：“代我交给那位女同志，对，就是杨瑞年。她待我是很好的。可是有人报告了项副军长。昨天项副军长把我叫去批评了一顿，说我刚到南方就腐化了，说本来叫我去做团长的，现在降为副团长。”当他把手中的信和钱递过来时，我看了看小纪，断然把它接了过来，又说：“一定交到，请放心。”他竟对我们敬了个礼，转身大步走了。

当我们去完成这“传书递笺”的艰难任务时，杨瑞年是愠怒的，她不肯接下信和钱，恨声说：“干什么缠个不完啊！”这下惹得我们也生气了，我说：“你发什么火，我们是受人之托，你为什么不同人家说清楚，害得人家挨批评！”我们把信和钱塞给了她，赶紧走开了。信，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写些什么了；五元钱，当时是一个团级干部一个月津贴费的全部（我们每月只发三元），吴焜大概是用这来表达他对杨瑞年的歉疚的吧，办法虽然不太高明，却不能不说这正是他的真心实意。这封信和这五元钱，以后听说杨瑞年交给组织了，究竟如何，我不便再问瑞年。总之，从此以